

东南亚与中国西南 少数民族建筑文化探析

杨昌鸣 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东方建筑研究系列

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 建筑文化探析

杨昌鸣 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内容提要

东方建筑文化在世界建筑文化宝库中占有与西方建筑文化同等重要的地位。研究东方建筑不仅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国建筑,也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世界建筑。

东南亚建筑文化是东方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主要研究东南亚早期建筑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建筑之间的渊源关系,着重考察东南亚建筑文化圈的文化背景及居住建筑的一般特征、聚居模式及聚居环境营构方法以及在这一区域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建筑——南传上座部佛教建筑的基本特征等若干问题。可供有关人士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建筑文化探析 / 杨昌鸣著.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3
(建筑文化论丛 / 王其亨主编)
ISBN 7-5618-1928-5

I .东… II .杨… III .古建筑-东南亚-关系-少数民族-
古建筑-西南地区 IV .TU-09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8079 号

出版发行 天津大学出版社
出版人 杨风和
地址 天津市卫津路 92 号天津大学内(邮编:300072)
网址 www.tjup.com
电话 发行部:022-27403647 邮购部:022-27402742
印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170mm×240mm
印张 11.75
字数 270 千
版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3 月第 1 次
印数 1 - 2 000
定价 35.00 元

目 录



序 言	(1)
一、东南亚建筑文化圈	
绪 论	(6)
第一章	东南亚建筑文化圈的背景研究 (10)
第一节:地理学背景	(10)
第二节:生态学背景	(12)
第三节:民族学背景	(15)
第四节:技术背景	(18)
第五节:宗教背景	(23)
本章小结	(27)
二、居住建筑	
第二章	若干建筑构成要素的比较研究 (29)
第一节:建筑材料	(29)
第二节:居住建筑的主要类型	(32)
第三节:屋顶形式	(37)
第四节:平面布局形式	(41)
第五节:火塘的意味	(47)
第六节:居住领域的限定	(52)
本章小结	(57)
第三章	干栏建筑研究三题 (60)
第一节:干栏建筑研究体系的演变	(60)
第二节:干栏建筑的构架类型	(71)
第三节:略论“长脊短檐”的发生与发展	(82)
本章小结	(98)
三、聚居环境	
第四章	“长屋”的比较研究 (101)
第一节:东南亚地区长屋的分布与类型	(101)
第二节:中国境内的部分长屋	(106)
第三节:长屋发生原因解析	(111)

041C69/01

	本章小结	(119)
第五章	村寨与公共性建筑	(122)
	第一节:从血缘村落到地缘村落	(122)
	第二节:村寨的建立	(124)
	第三节:村寨的公共性建筑	(133)
	本章小结	(141)
	(专题讨论):寨桩·集会所·鼓楼——侗族鼓楼发生发展过程	(145)
四、小乘佛教建筑		
第六章	云南傣族及泰、缅等国小乘佛教建筑的比较研究	(153)
	第一节:小乘佛教略述	(153)
	第二节:小乘佛教传入云南的路径和时间	(154)
	第三节:小乘佛教寺院中戒堂与佛殿的相互关系	(155)
	第四节:小乘佛教佛塔的类型和特征	(165)
	本章小结	(174)
后记		(176)
再版补记		(177)
参考文献		(178)

序 言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东方建筑?

郭湖生

自某种意义上说，建筑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许多文化现象，例如哲学、宗教信仰、社会制度、社会生活、艺术美学以及生产经济活动等等，或多或少(多至全体)或少(一些象征符号和手段)通过建筑表露出来。于是可以认为，建筑本身就是文化的一种存在形式。因此，研究建筑的深层，必然接触其文化内核。而文化的具体存在千姿百态，在不同深度层次相互影响，互为因果，互相交流，萌生出新品种新形态，精彩纷呈，从而构成了我们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线型发展的思想，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眼界，不足以完整地认识世界，也不足以正确地认识中国建筑自身。我们可以说，研究东方建筑是当中国建筑的研究达到一定阶段时必然要提出的问题。这样做，既是为了进一步理解自身，也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世界，是非常有必要的。

把地中海迤东视作东方，是欧洲人的说法。又分之为远东、中东、近东，大体上指的是亚洲和一部分北非。我们说的东方，大体也指的这一范围，只不过有我们的侧重点和划分方法。中国作为古代东方文明中心之一，本身就是被研究的重点，我们自己理所当然已有不少研究。然而这里提到的东方，却主要是指中国以外和中国毗邻或接壤的地区。在我们的计划中，大致分为四类。

一，东北亚。包含日本、朝鲜、蒙古等国，自古这里就是中国文化圈，关系密切。这里也是古代几种重要的游牧民族发祥地。

二，东南亚。包含中印半岛(Indo—China Peninsula)、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菲律宾群岛等。民族划分复杂，大体上属马来人种。早期传播小乘佛教，后来伊斯兰教进入，近代欧洲文化影响甚大。也是中国早期移民较多、华侨移民文化发达的地区。

三，南亚。包含喜马拉雅山南麓山地国家和地区(尼泊尔、不丹、锡金、拉达克等)、印度次大陆、锡兰岛等。是古代佛教的发祥地，对中国文化有深刻影响。喜马拉雅山地则与我国西藏地区关系密切。

四，中亚。大体上是里海、伊朗高原、阿富汗以东以迄中国的新疆地区。古代是北方诸游牧民族活动的场地，又是丝绸之路经由之地，古代多民族文化在此地交流传播。早期有祆教、聂斯脱里教，中世以后，则为伊斯兰化的诸民族(包含突厥语系与伊朗语系)的主要活动区域。在海上交通发展以前，这里是东西交通、贸易主要通道，文化的交流十分频繁。

何以研究东方建筑文化是为了正确认识中国自身的建筑文化呢?常有人认为中国建筑的研究已经够多了,似乎没有更多的事可做了。其实不然,对中国建筑的研究总体而言虽粗具规模,但浅尝辄止,不求甚解,乃至以讹传讹的情况尚多。许多问题至今若明若暗,似是而非。除了继续深入之外,另辟途径也是必要的。东方建筑的研究可以有助于此。

我们知道,作为中国历史文化主体的汉族,本身就是融合若干古代民族而成。汉族在其发展过程中,语言语音、服饰、起居习惯、饮食等方面大为改变,离开其最初形态已经很远很远。最显著的改变之一是起居方式。汉族自古采取席地危坐的习惯,由甲骨文可以证实。这种习惯现今日本和朝鲜尚可见到,而中国的汉族则早已改为高坐方式。最早高坐的出现,是汉代的“胡床”,源于古希腊的绳椅,经中亚传至汉地。当时仅在军中临时使用。至两晋南北朝,采用高坐的北方民族进入中原,一部分融入汉族,使汉族起居方式渐起变化。高坐到唐代中期才完全取代危坐,导致古代起居习惯也随之根本改变。这一变化的动因是外来文化经北方民族中介传入和民族的融合,单纯从汉族自身是无法解答的。但这一过程迄今仍不很清晰。

来自南方的影响,例如我国西南诸省至长江中下游民间普遍采用的穿斗架结构,最先也是西南盛产杉木地区的古代先民所发展,尔后传入了汉地,而部分西南古代先民也融入了汉族,以致穿斗架成为一种广泛的区域现象。这类因民族融合交流而导致起居方式、居住形式的变化还可以举一些例,如壁衣、毡罽、帐幕以及竹材竹具的运用等等。

可以说,汉族兼有一些北方民族和一些南方民族的文化特征,许多原先的族别特征经融化吸收变形只残存为地区特征。这种地方性用单一祖源是说明不了的。而我们在研究中会发现,若干先民从境外迁来,若干为跨境而居。这些文化如不超出国界加以宏观大系统考察,即无从正确认识。

越出国界、区界作宏观大系统的考察,例如近年来日本学者提出的“照叶林文化”包含东南亚、中国南部以迄日本本土及冲绳这一广大弧形地带。其共同特征是气候与自然植被的相似、水稻栽植、牛耕、竹器与竹编工艺等。中国古代的滇文化、闽越(粤)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等也属于这一大系统。宏观地研究这一系统的萌生、发展、在中国境内的存在与变化、其文化形态、信仰崇拜、聚居形式、建筑艺术等问题,必然要和同一系统的其他支系比较而后,才能更深刻准确地认识其位置、阶段和特殊性质。我们的研究必须既考察一般,也考察特殊;既有全局,也有局部。然而理顺其中关系,谈何容易,需要长期的努力。

中国也直接受到外来文化影响。最为明显的莫过于以佛教为媒介的印度文化和希腊化的罽宾文化(今阿富汗地区)的影响。中国境内佛教建筑如寺、塔、石窟等类型的出现,中国的哲学、文学、音韵、绘画、雕刻、装饰等方面所受到的巨大影响,是大家所熟知的。然而,佛教最初经由“西域”传入。西域民族杂处,文化、宗教情况相当复杂,却被《汉书》上用一个“胡”字概括。我们今天必须宏观地在较大范围内细心分析西域各族,才能正确理解中国佛教文化特色的由

来与形成，特别是佛教寺塔方面。

外来文化之又一例：河南巩县有一种“锢窑”，平地用砖或土坯砌筑拱券，不用模架，券身倾斜，贴砌而成，这和新疆吐鲁番土坯拱的斜砌法一样，中亚的“阿以旺”式也属同一系统。但追溯其源，据考古资料，竟早于四、五千年前的幼发拉底河上游(今叙利亚境)即已出现。究竟链的两端：西亚的两河流域和中国黄河流域中游，如何联系起来？通过哪些中介？迄今仍待研究。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理解，在研究中国建筑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外来文化因素，接壤跨境者固不少，来自远方者亦多。文化的交流早在文字出现以前很久就已开始，我们看到的只是历史长河中一小片段。何况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民族的总和才是完整的中国建筑历史。我国少数民族中跨境的如东北的朝鲜族和蒙古族，西北的乌孜别克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吉尔吉斯族、塔塔儿族，西南的苗族、傣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景颇族等等，对他们的研究，成为东方建筑研究的重要部分。这是我们说的“研究东方建筑文化是研究中国建筑文化到一定阶段时必然的引申”这句话的一个道理。

东方文化的许多方面，国外已有大量研究。特别是宗教方面主要的佛教、伊斯兰教、早期基督教都产生于东方，尔后传播世界，不乏专门论述。东方的一些国家如日本、印度，对其自身也作了详尽的研究。但是，我们也有研究东方的特殊优势。中国历史悠久，文献典籍丰富，在历代学者研究订正下，编年准确，考证翔实，可谓信史。中国很早就与周边地区交往，所谓中国文化圈、所谓以丝绸之路为主的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在中国历史中留下大量记载，成为研究东方必需的资料，而其丰富内容迄今仍在搜剔阐发之中。我们可以对东方研究特别是涉及中国文化方面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东方建筑的理由之二。

以日本为例。日本对自身早就详尽研究，似乎已经没有更多的事可做。对中国的研究也先于我国，早就开始，如伊东忠太、关野贞、常盘大定诸氏等等。饭田须贺斯的《古代中国建筑对日本的影响》是一本很详细的专著。即令如此，还不能说毫无遗憾。1983年，我同浅野清教授一道参观奈良药师寺修复工程现场，大工西冈常一先生向我展示日本木工工具。其中钢制曲尺，一面为公制，另一面分为八寸，赫然刻着“财、病、利、义、官、劫、害、本”八个字，分明就是中国的鲁班尺。他们不知此尺传自中国，只知沿用已久，称为“天星尺”，迄今仍用于佛坛一类小木作(大木用公制)。鲁班尺的运用表示中国匠师在日本的存在，这对日本建筑影响到什么程度？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很有趣的问题。这例说明我们易于发现他人之所未见，也较有可能解决他人之所不易解。我们还要问会不会还有类似的问题呢？

再举一例。琉球(19世纪中归属日本)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很深。冲绳的多处“石敢当”，已为大家所知。其实中国文化的痕迹远不止此。那霸市中心有座蔡温桥。蔡温是福建人，清初移民琉球，被当时琉球国王尊为国师。《琉球国志》有传。迄今冲绳岛北部名护市入口处仍矗立着国师蔡温所书标有乾隆年号的石碑。那霸波上宫附近公园山头上有几座古墓，葬着琉球音乐舞蹈几种“流”(流派)的始

祖。他们名字旁注明中国原有姓氏和籍贯，均为福建移民。波上宫附近的孔子庙、首里王宫的“守礼之门”、王宫附近的圆觉寺、琉球王室玉陵的石刻、那霸崇元寺门外的明代碑记，处处表明中国文化的影响。二战中冲绳战争激烈，许多文化遗迹毁坏不可复睹，但是如此深厚的中国文化累积决不是无可进一步追踪无可更加研究之处的。

朝鲜半岛的平壤、汉城和庆州，越南的河内和顺化等地，都是中国文化影响集中之处。我们如能参加研究，相信也会有有趣的发现。

中国领域广大，历史悠久，许多古代民族在此生息繁衍，交流往来。中国成为东方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造诣高深的汉学家，对中国文化包括建筑文化作了精彩的分析论证，贡献很大。尤其因为某些西方学者囿于以希腊罗马为正统主流、东方则为非正统非主流的成见(如以往版本的 Fletcher 的《比较建筑史》即是一例)，对东方认识有欠缺或曲解而有不完整不科学的论断，迄今未能彻底更正，更谈不上根本改观了。至于我们自己，如果看一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卷的条目表，就会发现，情况好不了多少，也是对东方的认识相当欠缺。一部新的、完整的、如实的世界建筑史，离不了建立一部崭新的东方建筑史。现在已是 20 世纪之末尾，但是迟做总比不做好。

上面说的分区划块并不是研究东方惟一的方法。横向时期分段的方法(例如元代或蒙古帝国时期问题就相当集中突出)，按宗教作专项研究的方法都是有益的、可取的。宗教建筑的研究和宗教教义、戒律、传法等方面的研究并不尽同。宗教的建筑存在及艺术表现带给我们的信息，常伴同着宗教以外特定的社会和民族的文化特征因素。我们说载体，就指的是这种多属性的信息传达。例如，我们从西藏的密教中可感受到印度婆罗门教的影响，而日本的密宗则更多是唐代汉文化的影响。又如，同为伊斯兰教寺院，而北非、西非和中亚、印度次大陆、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就各具特色。这一类问题，值得我们重视研究。在中国，研究东方建筑的倡始者是已故建筑学家刘师敦桢先生。他曾于 1959 年初率我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参观了阿旃陀石窟寺等多处佛教遗址。回国后当年招收印度建筑史研究生一人，并亲自讲授印度建筑史课。我们参加了旁听。先生渊鉴卓识，高屋建瓴，多次谈到开展东方建筑研究的必要性。先生学问似海，于佛教建筑尤为精深，他选择印度为始点当与此有关。可惜 1962 年中印关系恶化，以致影响向印度派遣留学生的计划，随后不久的十年动乱更使这一研究被搁置起来。现在我们追随先生开辟的道路，重新展开东方建筑的研究，缅怀先师，不禁感慨万端。

近年来我们在东南大学建立了东方建筑研究室，招收博士研究生，以学位论文形式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其间曾派遣研究生赴日本爱知工业大学，在日本古建筑权威之一浅野清教授指导下进行共同培养。浅野先生为学严谨、待人宽厚，酷爱中国建筑文化，至老弥深。他为中日学术友好交流、支持东方建筑研究作出重大贡献。老人不幸于去年病逝，我们深为悼念，并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我们的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这项研究虽然意义深远，但谈不上实际应用和可预期的物质效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百事待举，许多更为急迫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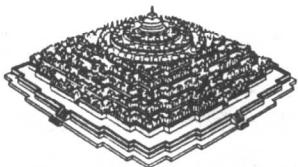
研究已提上日程，众多项目争向自然科学基金伸手。在此情况下基金的支持实属不易。我们衷心感谢基金委员会及时而有远见的支持。

我们面前并没有现成的路。只能一边收集资料，一边熟悉地理、民族、宗教、文化、历史情况，一边发现问题、整理问题、分析问题。从与中国关系密切的邻近地区开始，逐步扩大范围。现在呈现于读者面前的研究专著，就是这一过程的初步成果。热切期待读者给以指正、批评和支持。

我们期待和各界的交流，主要是资料和情况的交流。首先是与研究东方的文化、宗教、社会、民族、艺术、历史等机构及学者专家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其次希望和世界各国首先是东方各国研究东方的机构和学者个人联系和交流，特别是建立有东方研究机构的国家如日本、朝鲜(南北方)、新加坡、泰国、独联体中亚国家等等。也期望和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等国的东方研究机构建立联系，特别是与设在美国和瑞士的专门研究提倡伊斯兰建筑的阿加汗基金组织建立学术联系，与其他研究东方宗教或艺术的团体或个人联系。我们的目的是：建立崭新的、如实的东方建筑文化史体系，藉以充实、补足现代的世界建筑史。

1992年2月22日
于东南大学东方建筑研究室

一、东南亚建筑文化圈



绪 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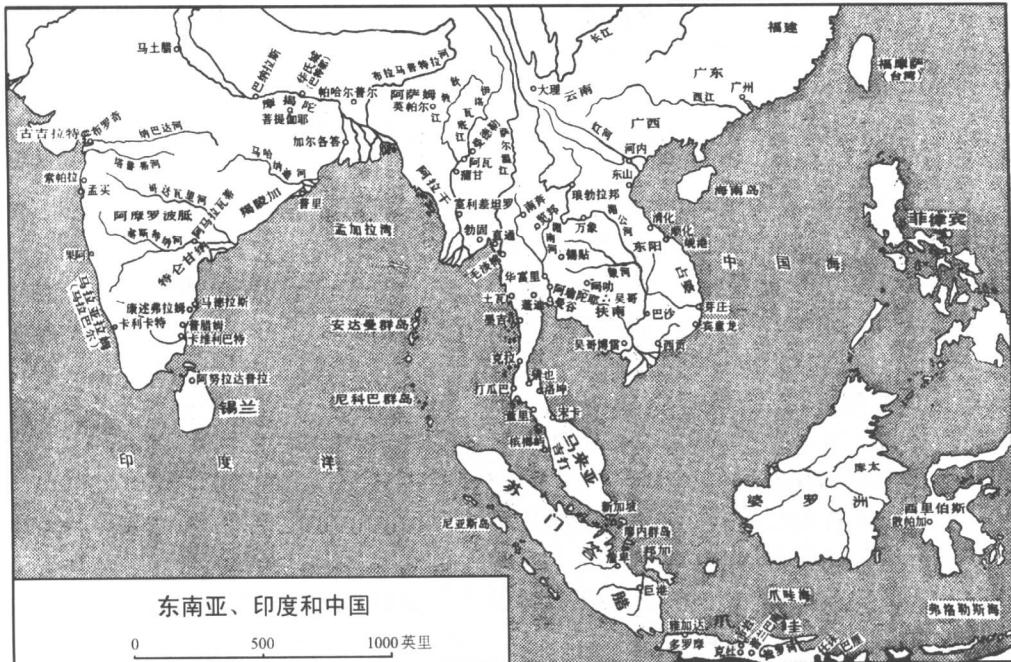
东南亚是一个具有多样统一性的地域。大陆与岛屿并存、山地与平原同在的地理特点，亚热带与热带气候逐渐过渡的自然条件，加上频繁的民族迁徙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构成了多样的生活模式及多彩的民族文化。

由于处在印度与中国的中间位置，东南亚从古代起就受到这两大文明古国的影响。外国学者一般把“东南亚分成两个主要文化区域：一是法国学者所称的‘外印度’，印度的影响在这一区域占了优势；另一个区域包括东京、安南和交趾支那，随着15世纪‘印度化’的占婆王国的覆亡，中国的影响便在这区内居于支配的地位”^[1]。这里所说的中国影响可能带有政治上的含义，而印度影响则主要表现在宗教方面。尽管如此，人们注意到，东南亚各国的固有文化“并非仅是印度或中国的文化附属物，而各自具有极为鲜明的个性。在吴哥、蒲甘、中爪哇和占婆古国曾开放灿烂的奇葩的艺术和建筑，与印度教的和佛教的印度的艺术和建筑相比，都有显著的区别”^[2]。然而，不可否认，“也正是在印度和中国文化的滋养下，东

东南亚史略年表(16世纪以前)

50万年前(?):爪哇猿人出现。 公元前7000年(?):中石器时代开始。 公元前4000年(?):新石器时代开始。 公元前1000—公元2世纪:青铜器时代开始，越南的文郎、瓯骆等初期国家形成()<br/ 2世纪末:Cham族在越南中部(林邑)崛起。 2世纪末:扶南大王范蔓，征服泰国湾及马来半岛一带。 3世纪末:越南出现东南亚最早的巴利碑文。 4世纪后半—5世纪:印度影响急速扩展。 5世纪前半:婆罗洲出现岛屿部最早的巴利碑文。 6世纪—7世纪:孟族崛起。 6世纪末:真腊(吉蔑族)强盛。 7世纪后半:义净三访室利佛逝，马六甲海峡交通繁荣。 8世纪中—9世纪:中爪哇的夏连特拉王朝强盛，真腊分成水、陆两部分，占婆中心南移(环王国)。 8世纪后半—9世纪:骠族没落，缅族及泰族势力南下。 802:吉蔑再度统一(吴哥王朝)。	929:爪哇的马打兰古国东迁，东爪哇时代开始。 10世纪后半—11世纪前半:三佛齐、占城等贸易繁荣。 1047—1077:蒲甘王朝阿奴律陀征服直通，接受了孟文化和上座部佛教。 1113—1150(?):吉蔑的全盛期(建造吴哥窟)。 1180—1218(?):吴哥城完工，吉蔑的最后的黄金时代。 13世纪—14世纪:吉蔑没落，泰系诸族崛起，接受上座部佛教。在陈朝统治下越南民族意识确立。 1277—1293:元世祖出兵东南亚各地。 1292:苏门答腊伊斯兰化开始。 1405—1433:郑和七度远航，马六甲等岛国兴盛，华侨活动频繁。 1432:暹罗(阿瑜陀耶王朝)攻击柬埔寨，占领吴哥;印度支那中部霸权向暹罗转移。 1460—1497:越南黎朝的黄金时代。 16世纪初:婆罗洲、菲律宾等伊斯兰化。
---	--

一、东南亚建筑文化圈



^[3] 南亚自身的文化才开始发展并且取得伟大的成就”^[3]。

东南亚这种特殊的文化构成也反映在建筑上，从而培育出独具特色的东南亚建筑文化。东南亚建筑文化在总体特征上应该归属于东方建筑文化系统，但它与该系统中其他几个区域性建筑文化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同时受到中、印两大古老文化的夹击，而其固有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又赋予它以明显的个性。不过，在它的身上，仍然残存着一些中国早期建筑影响的痕迹，也就是说在这个区域还保存着一些古老的中国建筑格局或样式。这大概是民族迁徙的结果，与政治没有太多关联。外国学者可能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和宗教方面，以至于将中国的影响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实际情况表明，至少在居住建筑方面，中国的影响曾散布于几乎整个东南亚地区。东南亚建筑文化的这种特殊性，对我们研究中国建筑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遗憾的是，学术界一直没有重视这个问题，迄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本关于东南亚建筑研究的专著，学术论文也少得可怜，这与我国建筑文化在东南亚建筑文化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相比起来，与之相距较远的日本建筑界却把东南亚建筑文化视作影响日本建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它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工作。当然，由于观点和立场的不同，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片面之说及偏差也不乏见。

事实上，在以往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工作中，许多学者都已意识到，同中国传统建筑一样，借助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不仅仅在中国内地，而且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乃至东方各国，都曾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产生过重

要影响，这些影响的残迹至今仍能见到，成为早期建筑发展过程的历史见证。

另一方面，民族迁徙的双向性也带来了一些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中国内地建筑中表现出来的某些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特点，很有可能在其他地区为人熟视无睹；而有些在局部地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跨区域的大范围内又是十分自然的现象，如此等等。

所有这些都充分证明，将我们的研究领域扩展到境外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大范围的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某些跨区域问题的解决，也可深化对中国建筑早期格局的认识。这就是开展“东方建筑文化研究”的原始动机。我们这里所要研究的东南亚建筑文化，正是该项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我们应如何着手这项研究呢？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注意到固有文化对建筑文化具有重要影响，而所谓固有文化，也就是民族文化。东南亚地区的固有文化是居住在这个地域的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要想全面深入地研究东南亚的固有文化，就必须研究这些民族自身的文化。建筑文化的研究也当如是。

民族学资料表明，居住在东南亚地区的许多民族，都不同程度地与我国西南地区的部分少数民族有着某些关联。人们发现东南亚古文化的主要因素几乎全都可以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中找到源流或踪迹，这是由西南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因为“我国的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省，恰好位于亚洲大陆与中南半岛的衔接之处。怒江、澜沧江、元江等南北向的大河，均由这里流入中南半岛。在古代，民族迁徙和文化传播往往都是借助河谷通道进行的。在山岭崎岖、交通不便的亚洲大陆南部，情况更是如此。大陆文化的向南传播，岛屿和滨海文化的北上渗透，都必须经过这一咽喉地带”^[4]。这种情况告诉我们，研究西南少数民族文化，正是打开东南亚文化宝库大门的钥匙；同样，我们要研究东南亚建筑文化，也可以通过研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建筑文化来寻找突破口。

从实际情况来看，在西南地区及东南亚部分地区生活的某些少数民族，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社会发展较为缓慢，直到晚近时期还不同程度地保存着早期社会的部分残余，并在他们的建筑上反映出来。通过对这些“历史遗迹”的深入解剖，并将残存的“历史碎片”小心地“愈合”起来，就有可能再现出一部民族建筑发展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研究就已不再只是适用于某个特定的地域的，而是可以普遍适用的理论研究了。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决定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西南地区及东南亚地区的建筑文化纳入一个大背景之下进行综合考察。为便于研究，我们可以借用文化人类学的“文化圈”理论，建立起“东南亚建筑文化圈”的概念来界定这个大背景。

“东南亚建筑文化圈”是一个超越原有政治和地理区划的概念，它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即东南亚大陆部分，包括中国大陆长江流域以南直到中南半岛马来西亚南端，东起中国南海沿岸西至缅甸伊洛瓦底江这一广阔区域；另一部分则是东南亚岛屿部分，包括中国的台湾、海南岛，以及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及苏门答腊，甚至还可延伸至琉球群岛及南太平洋的部分岛屿。之所以要作这样的划分，并不是想要强调我国南方文化的独立性，而是因为在这样一个范围广阔

的大区域内存在着许多共享的文化特质，将它们置于同一文化背景之下进行考察，更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各个局部地区之间的共性与个性。不过，在具体研究时，我们仍然用东南亚地区或西南地区来代表政治和地理区划概念，以免混淆。

本书将首先讨论东南亚建筑文化圈的背景特征，以期形成对这一地区基本情况的总体印象，然后分别对居住建筑、聚居环境以及小乘佛教建筑这三个方面的几个问题进行讨论。虽然这些问题只涉及居住建筑与宗教建筑这两个领域，但因它们在早期建筑文化中由于数量的优势而占有主导地位，使得它们基本上可以反映出早期建筑文化的主要特征。(尽管宗教建筑出现的时间稍晚，但它对早期建筑文化的影响也是明显可见的)

至于具体的研究方法，则试图将对建筑的具体描述同对民族文化和社会结构的考察结合起来，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尽量利用民族学和考古学材料所提供的线索去追溯某些早期建筑的发生、发展过程，以期获得与事实尽可能接近的认识，因为“各种习俗只有在其特有的社会内部逻辑中才是有意义的”^[5]，建筑也不例外。

东南亚建筑文化的研究是一个相当复杂而又引人入胜的课题。在我国学术界对东南亚建筑文化研究几乎仍是空白的情况下，限于学识及资料的贫乏，本书只能对这一课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谬误之处还盼诸位先学同好不吝指正。

需要说明的是，为尊重原作者起见，本书对所引文献中的文字及计量单位一律保持原貌，因而在行文中难免出现一些同音异写字，也难以完全统一计量单位，敬请原谅；对于本书所涉及的外国人名、地名、民族称谓等，除有常用译文者外，尽量采用原文，以免误会。另外，本书选用了国内外有关文献中的多幅图照，恕不一一注明出处，谨向原作者一并致歉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注释：

- [1] [英]D.G.E.霍尔：《东南亚史（上、下册）》，p.20
- [2] [英]D.G.E.霍尔：《东南亚史（上、下册）》，p.21
- [3] [英]D.G.E.霍尔：《东南亚史（上、下册）》，p.21
- [4] 童恩正：《中国西南地区民族研究在东南亚区域民族研究中的重要地位》，p.41~42
- [5] [美]罗伯特·F.莫菲：《文化和社会人类学》，p.6~7



东南亚建筑文化圈示意

第一章 东南亚建筑文化圈的背景研究

任何建筑都不能脱离其周围的背景而存在，东南亚建筑文化圈也有着特定的背景。不了解这些背景的特点，就不可能真正全面地了解东南亚建筑文化圈的本质。构成这种背景的因素很多，本章仅择其要者略作分析。

第一节 地理学背景

正如《礼记·王制》所载：“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文化的形成都必定与其特定的地理学背景有着密切联系。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认为：全部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地理提供了历史和文化的自然背景和舞台场景，历史事实与它联系在一起才具有意义。这个观点虽然未免过分夸大了地理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但它所提供的将历史事实与地理环境联系起来考察的研究方法则是可取的。

如何看待地理环境与文化的相互关系，历来有不同的观点。“惟智慧论”完全排斥地理环境的影响，将文化简单地归结为人类的精神产物，或者是天才的创造；而“地理唯物论”则认为地理条件规定着民族性与社会制度，制约着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方向；孟德斯鸠更系统地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过分强调自然条件对人类历史文化的影响，这样都难免得出气候单独决定民族性、地势直接左右社会制度之类的片面性结论^[1]。

明人杨慎说：“人也者，非水土不生，而非水土所能囿也。……人之性禀于天，自王畿土中至于海隅，日出一地。习也者则系乎君之令，师之教。而非水土所函也。”^[2]他对于地理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已经有所认识，但仍有将环境因素与人文因素对立的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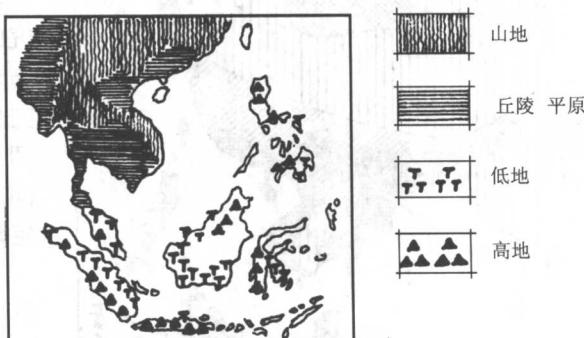
我们认为，地理环境的确对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单独存在的。文化是地理环境与人文因素的复合体，地理环境可以为文化的发展提供多种可能性，但作出最终抉择的是人而不是环境，因为人类的活动除了受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之外，还要受到其他社会因素诸如政治、心理、经济、传统等等的制约。如果说某种文化生成的初期阶段，地理环境的影响占有一定分量的话，那么，在这种文化的成熟阶段，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就会远远超过地理环境的影响。而且，人文传统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巨大的惯性，成为推动文化发展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地理环境通过物质生产及其技术系统这个中介影响着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进程。地理环境的差异对物质生产方式的影响反映在文化的区域性特征上，进而导致不同地域的不同民风和习性，以至于有“沃土

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3]的区别。从古人对“风俗”的解释中，也可看出地理环境与人文因素互相融合的作用：“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运静亡常，视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4]。理解了地理环境与文化之间的这种关系，才能理解为什么在相似的地理环境中会有不同的文化类型以及为什么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也会出现类似文化类型的情况。建筑与地理环境之间同样存在着这种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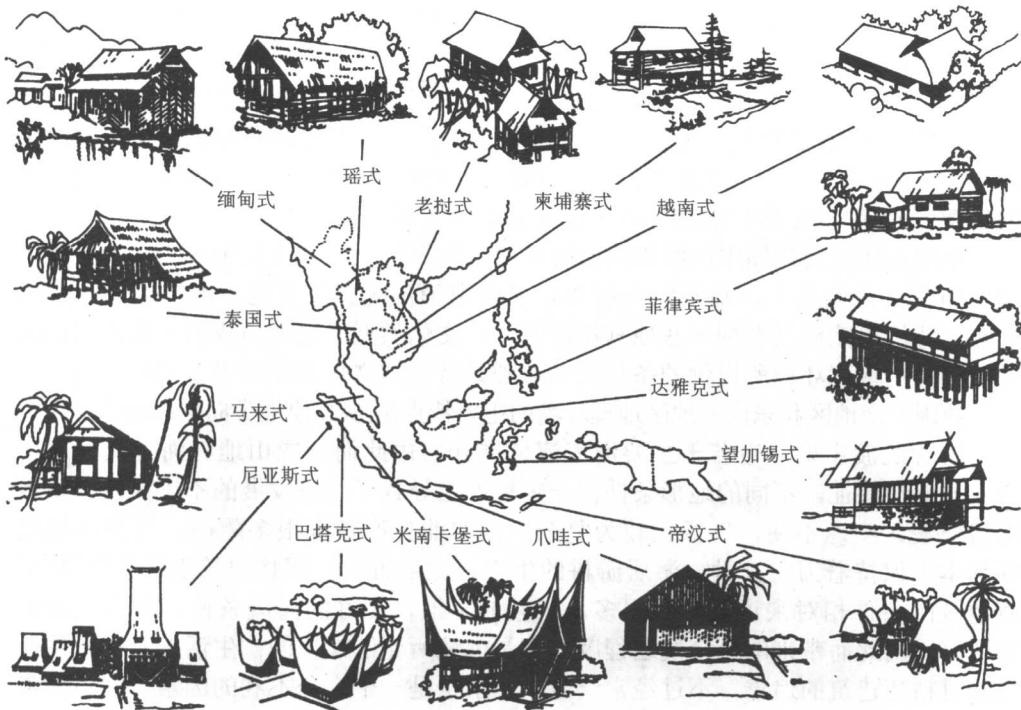
东南亚建筑文化圈中的我国西南地区及东南亚地区大体上处于同一地理环境之中，但在文化类型上，却并不完全相似。尽管中华传统文化在这一地区具有一定的影响，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类型。这就为我们考察不同的民族如何利用地理环境所提供的条件去创造独具特色的文化类型提供了极好的线索。

我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地理环境的主要特点是：从高原地带向平原地带急剧过渡，这种过渡主要沿着若干主要河流流域展开，由此而形成山地、河谷及平原三种主要地形特征。不同的地形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山地地势险峻，交通不便，气候也较为复杂，为农业生产带来很多障碍，许多山地民族基本上保持着刀耕火种、游居游耕的生产、生活方式，居住建筑也极其简陋；平原地区的条件相对来说就要好得多，平整的土地，良好的灌溉条件，四通八达的交通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经济发达程度，都是山地所无法比拟的；生活的富裕必然伴随着对精巧建筑的追求，不过经常泛滥的洪水也是一个十分不利的因素。河谷地带带有山有水，条件优于山地，逊于平原。

如果我们根据气候的类型来作一个简单的分类，则可将这一区域分为两个组别：一组是中亚热带、亚热带和热带季风气候，包括云南、贵州、广西、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北部、泰国等，也就是我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大部分地区；另一组是热带雨林气候，包括缅甸沿海地区、泰国沿海地区、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多为半岛及岛国。这种区别与一般常见的东南亚大陆部分及东南亚岛屿部分的区划是大致吻合的。总的来看，气候的变化特点是从中亚热带季风气候（黔东南、桂北）向热带雨林气候（东南亚岛屿）过渡，中间经由热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云南、桂南）及热带季风气候（越南、柬埔寨等）两个气候地带，由北向南逐渐变暖，与地势由北向南逐渐降低的情况相同。这种气候的变化规律在这一地区的建筑上也有反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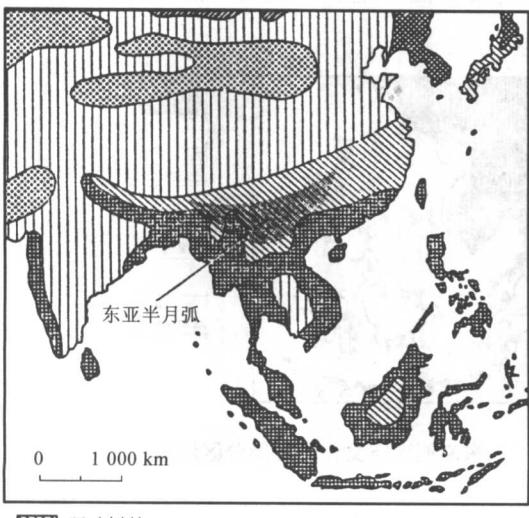


东南亚建筑文化圈地形分区示意



东南亚地区适应不同气候条件的房屋类型

第二节 生态学背景



■ 热带雨林
■ 热带、亚热带林

东南亚的植物分布

生态学研究的是生物之间与非生物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所研究的文化的生态学背景则更关注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与人类发展密切相关的植物、作物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特定地区文化性质的影响。

在东南亚建筑文化圈的生态学背景中，最值得注意的问题也许就是“照叶树林文化论”及“稻作农耕文化论”这两种理论所触及的问题。

“照叶树林文化论”是近年来